

第一章 关注大众传媒素养的意义

大众传媒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一般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评判、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大众传媒素养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体所从事的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诉求及基本看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个人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大众的传媒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社会体制及社会观念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传播体制及传播观念同样也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一些大众传媒素养中的核心问题，例如如何界定传播机制的价值，如何认知传播媒体的本质，如何解读传播信息的内容等，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便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因此，关注大众的传媒素养问题，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传媒生态的变化

大众传媒素养是社会文明的衡量标志，是社会进步的考察指标。就整体而言，大众传媒素养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大众传媒素养的程度必然不高；当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时，大众传媒素养的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当社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时，大众传媒素养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当社会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大众传媒素养必然会发生某些变化。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于大众传媒素养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要透彻地解析大众传媒素养的变化过程，需要首先分析一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传播媒体的生态环境。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探索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但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同步起始的，而是晚了近 10 年左右理论的阐释和实际的发展之间形成了一个时间差。直至 90 年代初期理论界才开始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学者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探索目前社会转型这一话语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

回顾一下我国理论界对于社会转型的探索，可以使我们看清在这一问题上理论建构的轨迹。早在 1992 年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1994 年宋林飞指出：“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 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③。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④。郅正认为：“社会转型被描述成一种整体性发展和特殊的结构变动。”^⑤陈晏清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社会整体性变迁即结构性变迁。”^⑥李钢认为，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

王雅林.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 江苏社会科学, 2000(2)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1992(5)

宋林飞. 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 江海学刊, 1994(2)

陆学艺、景天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郅正.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4)

⑥ 陈晏清. 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湘潭大学学报, 1998(4)

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方面的‘革命’^①。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学者们的论述，我们就不一一引述了。

迄今为止，我国的理论界对于社会转型的定义还没有非常权威的看法，学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转型进行阐释。尽管如此，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还是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所谓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化，其基本特征为广泛性、复杂性、动态性。就一般意义来说，涉及社会体制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社会形态的变迁三种意义^②。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来说，就是从计划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封闭性一元化文化形态向开放型多元文化形态过渡，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转型。

2.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象描述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十几亿人民参与的伟大的社会活动，在当代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中外人士所感知，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近年来，对于当代中国的描述，似乎没有比‘变化巨大’这一词语使用的频率更多的了。假如一个中国人多年侨居国外，几年未回国探亲，当他一踏上祖国土地时，首先感叹的就是变化巨大。假如一个外国人以前对于中国有所了解，但已多年未回来中国，当他重访中国时，也一定会惊讶于中国的变化巨大。即使是一个本乡本土的中国人，也会对自己家乡的变化感到惊喜和自豪。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带来了广泛影响。

经济改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在中国，“转型”一词首先被用于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农村的经济体制

李 钢. 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 社会科学辑刊, 2000(1)

② 宋林飞.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度量. 江苏社会科学, 2000(6)

孔 祥 东.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闻转型. 甘肃社会科学, 2003(5)

改革开始的，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先导。邓小平曾经对此进行阐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 没有农村这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 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积极性。”^①。当时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②。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然后就迅速推广到城市。城市的经济体制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计划经济的因素日益减少 市场经济的因素日益增多 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充满了勃勃生气 开始起飞。从商品形态来看 中国脱离了生活必需品时代 进入了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 从社会资源来看 中国脱离了靠行政命令强行分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按照经济规律合理配置的时代；从经济体系来看 中国脱离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不断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时代。

政治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政治改革。早在 1985 年 邓小平指出：“政治上发展民主 经济上实行改革。”^③，这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所设定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政治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设定以后，曾经有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例如 党政分开 权利下放 精简机构 推行县以下政府领导的群众直选 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 各级领导干部要进行经济收入的申报登记等等。和社会转型之前相比，中国的政治氛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宽松。

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倾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众所周知，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中国的社会文化一直就是一种泛政治文化，即是一种处在政治架构下的文化形态。例如 当时的一切文艺形式 无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15 页

不服从于政治宣传的具体任务，凡不符合政治宣传价值观念的所有文艺作品 都会遭到批评和指责。思想战线、道德领域、教育方面 乃至社会风尚、社会习惯等 均打上了政治的标记 以是否能够满足政治需要为指归。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完成了由单一价值观念到多维价值取向的过渡。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各个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原有的文化形态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已经基本形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间 社会文化的五光十色、杂然相陈俨然成了一道引人眼球的风景线。

但是，和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不平衡的。中国是一个具有 5000 年历史、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 这样的国情决定了社会的转型不可能四平八稳，一夜成功。例如 农村的改革带动了城市的改革以后 但农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却停滞不前了 于是就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 政治改革虽有宏观目标 但缺乏具体有力的部署 成效不大 腐败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虽带来了繁荣，但落后腐朽的观念特别是封建主义的精神垃圾沉渣泛起 毒害人们。不过 无论如何 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3.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分析

诚然 社会转型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 但它绝不是一般的有关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而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化的客观现象。其实 世界万物没有绝对的静止状态 任何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动态之中。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社会 都可以得出结论说它都在向某一个方向发展 而且不可能完全遵循直线型的发展模式。不管发展的方向是正是负，它总是曲折地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处在一定的转型之中。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而是在历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转型。

探讨这一问题的语境转变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在中国的理论界，

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化的语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先，人们用改革开放一词来描述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客观现象，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才改用社会转型一词来描述同一种社会客观现象。如果说用改革开放一词还只是停留在局部性的战术层次的话，那么用社会转型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中国的变化，就达到了全局性的战略层次了。因此，无论从社会视角或是从历史视角，社会转型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也许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经历过好几次社会转型，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又转型为共产党领导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转型。

分析社会转型的本质的主要依据是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解放。如果一种社会转型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转型就具有进步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应该被肯定；反之，如果一种社会转型不能够解放社会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社会转型就具有退步的性质、反动的性质，应该被否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思想的禁锢和体制的束缚，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产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①。但自改革开放短短的二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力的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这是由于当代中国的这次社会转型冲破了原有的桎梏，极大地激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达到 1000 美元，经济总量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页

已经位居世界第 6 位，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中国的国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逆转，因为它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欢迎。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二、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

1. 传媒生态的界定

近几年以来 传播学界对于传媒生态的研究日益注重 传媒生态学成为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传媒生态已经成为传媒研究中的热门名词，我国的传播研究学家在撰写传播学学术论文时也经常使用传媒生态这个概念。

生态学一词原先指的是对于生物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后来才逐渐被沿用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就像结构一词原先是建筑学上的特有概念 后来被沿用至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一样。所谓传媒生态，指的是传播媒介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所谓传媒生态研究，是指用系统论及控制论的方法来探求传媒和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传媒本身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家苏钥机先生认为，传媒生态学共有四个分析层次 同一个传播组织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及互动 同一种传媒类型中不同传播组织之间的关系及互动，不同类型的传媒之间的关系及互动，社会传媒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及互动^①。国际上的传播学家赫希 (P. Hirsch) 对于传媒生态学的界定和苏钥机基本一致^②。但在我国传播学家的视野中 比较着重于其中的第四个层次 即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传媒和社会其他系统以及社会总系统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既然传媒系统是社会总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一方面 作为子系统的传媒 必然受制于社会总系统 另一方面 它又给予社

纪东. 传播理论——上课讲义书. 台北 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 348 页
郑翰林 编译. 传播学简明词典. 台北 风云论坛出版公司, 2003. 34 页

会总系统以一定的影响。这就是关系和互动的含义。但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能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的理解，而是应该有所侧重。在一般情况下，首先是传媒系统受制于社会总系统，其次才是传媒系统影响社会总系统。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传媒生态的时候，首先应该研究中国的社会总系统，即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

2. 中国传媒生态的三个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生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就媒介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纸时期、报纸、广播和电视共栖时期、互动多媒体时期；就传播方法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有限言论表达时期、意识形态宣传时期、多种信息交流时期；就主流学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报学时期、新闻学时期、传播学时期。当然，依据不同标准划分的时期之间并不具有严格的对应性，因此这种划分还不能说是非常科学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研究问题更方便一些罢了。

第一个时期大致是从 19 世纪中叶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有 100 多年，包含了清代和民国两个阶段。清代和民国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传媒生态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清代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王朝。按照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报刊四种理论，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对应的是极权主义的传播和实践。事实上确是如此。清代对于思想的禁锢和传播的压制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其间冤狱之多、刑罚之酷、涉及之广、贻害之深，只要稍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了然于胸。“避席莫问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这一诗句既写出了清代知识分子的无奈，更隐含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默默抗议。但是，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由一个封建落后闭塞的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就使原先的传媒生态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他们再也无法使用早年的残酷手段来控制大众媒介，以致在晚清时代中国的传媒生态有了一丝丝的转机。这是由中国传媒生态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主要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 近代中国最早的大众传媒是由外国人在诸如澳门、香港以及上海的租界里创办的，最初是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根据西方的理念及西方的模式创办的宗教性报纸和信息类报纸等。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清代统治者根本无权管辖洋人事务，只能听之任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客观因素，为国人办报创造了条件。

第二 清代统治者的所谓皇家威权受到了外国列强的沉重打击 禁锢思想、压制传播的专制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加之 当时的政坛危机四伏 风雨飘摇 统治者无法腾出手来打压民间报业。

第三 清代统治者为了要挽救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国 保住它的根本利益 也在想方设法地寻找治国良方 以便救危解难。

鉴于这些因素 近代中国的传媒生态和清代早期相比 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传媒业显得非常活跃。例如在当时的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上海，出现了几十种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的新学报刊 如《强学报》、《时务报》、《新学报》、《中外日报》、《求是报》、《格致新报》、《集成报》等。一些中国的报人例如王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提出了报刊言论自由的观点^②。

民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 38 年 其间既有军阀混战 又有外敌入侵，还有国共内战 充满了变化、动荡和战火 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但却很难界定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因为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 是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 但事实上他的理想没有实现 因此从社会实际来看 中国的传媒生态和清末相比 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当时统治者仍然具有专制性质，他们在主观上绝对不会去改善传媒生态 推动中国传媒事业的进步 但在客观实际上中国的传媒生态并未明显恶化。在上海这样的传媒中心，一些报刊仍然可以发表有限的言论，一些报刊具有了全国的影响 例如《申报》，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状态。一些新生代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发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4页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141页

挥着它们的影响 例如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当时的传媒界占有一席之地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还是把这一阶段和晚清放在一起，称之为中国传媒生态的第一个时期，亦即有限言论发表时期。

第二个时期大致是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 大约 30 余年。这一时期传媒生态的主要特点是传媒机制及传媒机构均隶属于社会政治架构，传媒主要担负起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形态，和以往历史上任何形态不同，传媒生态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社会的性质上分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特别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由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并不断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以巩固国家政权；经济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国家所有及集体所有的经济体系，并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文化上对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文化进行了批判，扫除传统形式和外来形式，以建立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文化。依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的传媒生态是一种崭新的传媒生态，成为社会总系统中的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并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在这种传媒生态中的传播体制和传播现象，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传播组织的等级性 传播机构的工具性 传播信息的功利性 传播渠道的狭窄性 传播受众的被动性，信息反馈的缺乏性等。

传播组织的等级性是由所有的传媒机构都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这样一个特点所决定的。在这一时期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大众传媒都隶属于各级政府，毫无例外。即使是一些行业报纸，实际上也是为各级政府所拥有。一些群众组织主办的大众传媒，其背后都有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政府有乡、县、市、地区、省、中央几个层次 所以中国的大众传媒天生就有各种等级。中央电视台之所以财大气粗，就因为它属于中央一级，可以产生全国影响。其他电视台之所以无法和它竞争，也仅仅

因为级别上不可能逾越它，而不是在媒介产品的质量上无法逾越它。传播机构的工具性同样是由所有的传媒机构都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这样一个特点所决定的。传媒隶属于政府的宣传部门主管，成为各级政府的工具理所当然。而且所谓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大众传媒也极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某些人员的工具。而既然大众传媒是一种工具，那么传播信息的功利性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如果传播信息缺乏功利性，就必然无法发挥工具的功能。传播渠道的狭窄性其实也是由社会的政治架构所决定的，因为所有的大众传媒都由各级政府主管经营，除此以外任何人不得涉足大众传媒，这就使传播的渠道显得相对狭窄了。传播受众的被动性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方面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就是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当然不大可能使一般受众和大众传媒主动进行平等的良性互动。就实践方面来说，在一个信息尚未完全公开的环境里，受众况且也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对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也无法进行验证。如此一来，信息反馈的缺乏性也就油然而生了。由此可见，处在这种传媒生态中所产生的传播现象的种种特性，都与传媒生态的子系统和社会总系统之间的关系过于僵化、缺乏一定的宽松和柔性有关，也就是说，与传媒机制和传媒现象过多地依赖于社会政治架构有关。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话语的出现，都预设着一个语境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成了中国媒体上最常用的一个话语。其实，对这一话语的认可本身就凸现了当时体制的不合理性以及当时社会的封闭性。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改革开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确实可以发现许多体制上的缺陷，包括传媒生态上的缺陷。

但是，假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社会体制上的缺陷一开始并不是缺陷，而是长处，正是历史的发展使长处变成了缺陷。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了俄国革命的经验，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党当然要求所有的组织都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以便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新闻传播组织自然也被归纳到这一范畴，要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不可或

缺部分 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以完成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 , 团结群众的伟大任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策略 , 革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列宁新闻传播思想的精髓 , 毛泽东新闻传播思想的要点 , 皆在于此。我国著名新闻改革理论家孙旭培先生指出 : “ 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 , 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制的党的机关报体制。全国解放后 曾在短时期内 (约两年时间) 出现过党报、非党报并存 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的局面 但不久便使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报政策 作为整个国家的新闻制度。”^①这种新闻制度 , 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中 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 当时的理论和体制不一定符合现在的情况 , 某些历史上的长处就会变成当今社会的缺陷。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分析了对于《北京日报》宣传效果的调查 得出了由于新闻报道的模式已经陈旧和老化 致使报纸宣传造成了三低 即阅读率低、可信度低、价值低的结果^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社会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势在必行了 传媒生态的变化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个时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目前为止 只有短短的 20 多年时间 , 可以称之为信息传播交流时期。在这个时期 ,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 , 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 其意义不亚于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传播生态的变化来说 , 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 中国传媒界同样也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 , 从而使传媒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改革方面来说 , 把原先的传媒机构从事业机构变为企业单位 把经济因素引进传媒的经营与管理 使传媒的评价标准从单一政治指标变为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综合指标 , 以致于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 , 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数量十分可观的传媒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从开放方面来说 目前 中国的部分传媒产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 , 多种成分的传媒经济

孙 旭 培. 当代中国的新闻改革.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4. 444 页

喻 国 明. 中国新闻业透视.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93. 23 页

正在形成。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传媒产业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是从整体上改变了原有的传媒生态。传媒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带有根本性质，它导致了传媒领域内的一系列变化。上文所提及的原先中国传媒体制上的某些问题，例如传播组织的等级性，传播机构的工具性，传播信息的功利性，传播渠道的狭窄性，传播受众的被动性，信息反馈的缺乏性等，都随着传媒的经济改革而改变。

一个崭新的传媒生态的雏形已经在当代中国社会诞生，和以往的任何一个传媒生态相比，更具有开放性、进步性、完善性。它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中发挥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还尚未结束，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还尚未完成，中国传媒生态的塑造尚未定形，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还需要传媒学界的不断努力。

3. 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特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国传媒生态。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的是中国传媒生态的三次变化 即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的变化以及 20 世纪 80 代初期发生的变化。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的是第三次变化，亦即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大致有下列几个特性：

首先 变化动因的依附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 并不是传媒系统本身的主动求变，以适应全新的历史条件，而是被动地随着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而变化，有一种明显的依附性。当社会的各个系统如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乃至政治系统在纷纷改革的时候，传媒系统无法因循守旧，只能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来改变自身的形象。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动因，主要并不是来自传媒组织的内部，而是来自传媒组织的外部。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与其说是传媒自身变革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被其他系统的改革所带动的结果。从一般的原因来讲，传媒生态本身就隶属于整个社会生态，受到社会生态的制约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从特殊原因来讲，当代中国的传媒系统牢固地依附政治架构的体制，导致传媒组织不大可能率先主动地寻求改革。或许，中国传媒组织的内部确有要求改革的独立呼声，但一般来说很难形

成气候。因此，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依附性依然明显。

其次 变化过程的渐进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 不是突变形式 而是渐变形式 不是高屋建瓴、摧枯拉朽式的暴烈行为 而是和风细雨、有理有节式的温和行为 不是全面出击、四处开花式的莽撞举动 而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稳重举动。中国的传媒改革所涉及的许多问题 例如传媒角色的定位、传媒的产业化、传媒市场的开拓、传媒资金的运作、大众传媒的平民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传媒法规的制定、对外报道的改善等 都是一步一步地逐步解决的。这一特性 实际上也是和变化动因的依附性紧密相关的。自 80 年代以来，为了避免发生社会的动荡 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取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用了渐进形式 以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方法实现改革的目标。社会总体改革的渐进思路一旦确定，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传媒改革当然只能循序渐进了。其实，如果借用描述国民经济运营状况的一个专有名词“软着陆”来说明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那倒也是十分熨帖的。

第三，变化目标的务实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变化的目标是非常务实的，它既不追求实际上哗众取宠的花哨过程 也不追求理论上虚无缥缈的浪漫境界 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例如 传媒之所以要走产业化的道路 是因为政府“已经难以承受对传媒的财政补贴”政府“不堪财政重负，把传媒推向市场”^①。事实上，中国的传播系统改革还是比较全面的，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传播观念的改革 传播体制的改革，传播实务的改革。诚然 这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的 但一般人都这样认为 就近十几年的改革带来的效果而言 传播实务最好 传播体制稍次 传播观念更次。仅此一例 可见中国传媒生态变化务实性的一斑。

最后 变化的相对滞后性。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 和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有一个时间差。相对于我国社会目前的经济生态来说 传媒生态的变化就明显滞后了。在我国 传播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是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的，而新闻传播

体制的改革历来是政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不可能超越政治改革的进程。而中国的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明显滞后，政治改革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宏观目标，但尚未出台必要的部署及具体的措施，因此要达到政治改革的目标还非常遥远。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原因，中国传媒生态的变化和其他社会系统相比不可避免地滞后了。

第二节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信息特征

大众传媒素养是一种对于传媒现象的认知过程，其中包括了对于大众传媒信息特征的把握。把握大众传媒信息的特征，是正确解读大众传媒信息的前提。大众传媒信息的特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传媒生态的改变也会导致信息特征的改变。既然当代中国的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大众传媒的信息特征有什么变化呢？在当代中国崭新的传媒生态中，大众传媒的信息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们依据现代传播学的基本原理，从信源、信道、信宿三个方面做一个分析。

一、传播信息来源：从关闭到开放

1. 回顾 信息来源的封闭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传媒生态中，大众传媒的信息是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流动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受到严格控制，只能从有限的社会渠道获取必要的信息。而在获取这些信息之前，各级政府的宣传部门就已经对它作了严格的审查了。传播学原理中有一个守门人理论，指的是信息在大众传媒流动的过程中，处于传媒节点的守门人会对于信息进行筛选，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通过，哪些信息不能通过。只要有一个节点上的守门人关闭某一信息流动的通道，这一信息就不可能在媒体上出现，为大众所知晓。这一理论既适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传媒生态，又不适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传媒生态。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传媒生态中，信息尚在政府部门且还未进入大众传媒的时候就已经被拦截、被检查、被过滤了。

从形式上来看，大众传媒的主要信息来源有三个：政府机关的宣传

部门、政府的通讯社以及大众传媒自己采写的消息报道。由于大众传媒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工具，因此各级政府指令发表的消息报道，大众传媒必须坚决照办。例如，在十年动乱时期，各级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各级电台中喋喋不休地广播关于阶级斗争的消息，各级电视台连续不断地播放关于阶级斗争的报道，无不都是政府机关宣传部门指令的结果。当时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各类消息，实际上只是政府宣传主题的扩展而已。而大众媒体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是配合政治宣传的一种形式。就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就是政府宣传部门一家。除此以外，别无分店。当时有一句民间的流行语：“小报抄大报 大报抄梁效”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众传媒消息来源的封闭性。当然 这里的“小报”不是指现今格调低下的地摊报纸 而是指各级地方政府的机关报 这里的“大报”是指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即《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实际上也包括《红旗》杂志 这里的“梁效”是“两校”的谐音 是当时北京大学大批判组、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这两个学校的大批判组，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 实际上就是“四人帮”的死党。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对此一定记忆犹新。

信息来源的封闭性导致了信息内容的单一性 除了假、大、空 还是假、大、空。当时版面最多的《人民日报》才有八个版面 其他报纸按规定不能超过《人民日报》，所以一般都只有四个版面。而且所有报纸的新闻报道几乎一样，绝对不可能出现独家新闻。当时判断新闻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具体表现为唯政治论和泛政治论。唯政治论认为只有政治事件才有新闻报道的价值，非政治事件没有新闻报道的价值；泛政治论把一些本来并不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硬和某一政治观念挂钩，使之具有政治色彩，然后再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大肆宣传^①。在这种新闻传播观念的指导下，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事件被故意忽略了，一些根本没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却在大众传媒上被故意

陈先元. 单一观念和多维取向：试论我国新闻传播价值观念的变化.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1998(2)

反复强调。例如,1969年7月,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计划顺利实现,39岁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上了月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一步,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当时全世界数十亿人口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然而8亿中国人民却无从知晓。1976年7月,我国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然而当时的大众媒体稍做报道以后,就突然失语,转而去大肆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了。在十年动乱时期的中国传媒生态中,诸如此类的新闻怪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2. 当前 信息来源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大众传媒信息来源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开放模式。目前,中国大众传媒信息来源的范围之大、渠道之广、方式之多、涉及之深,恐怕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传统媒体和现代新媒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的信息来源,比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的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除了政府部门及国家通讯社以外,基本上还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通过媒体本身人员的采写获得信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以编发上级的统发稿为主,现在已经转变成编发自采稿为主。而大众媒体的记者采写新闻信息的方式也有了巨大变化。以往是计划性采访,即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配合宣传主题去采访某人某事,并编发新闻报道,而今是市场性采访,即根据发生的客观事件,选择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因此,仅此采访方式的改变就已经使大众媒体信息的来源大大增加了。

第二,中国的大众媒体在发挥自身采访优势的同时,还尽量利用社会的力量扩大信息来源。这其中有两种方法,培养新闻线人和鼓励受众提供新闻信息。新闻线人是指社会上的、不隶属于任何媒体的、职业或半职业的新闻信息的自由提供者,可以称之为没有记者证的记者,或是“准记者”。他们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同时也从媒体得到相应的报酬。这是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以后的产物。中国媒体改革以后,由于